

文章编号: 1673 - 0453(2008)04 - 0015 - 05

抗日战争时期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略论

韩荣钧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 20世纪的日军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其疯狂侵略。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天主教、基督教上层势力,基本上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采取一种中立甚至袒护、支持日本侵略的态度。但这不是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的全部,广大的爱国教徒激于国家、民族大义,以无畏的牺牲精神投入到神圣的抗战中去。应把广大宗教人士的爱国实际行动与宗教上层的反动指导思想区分开来。

关键词: 抗日战争;天主教;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识码:** A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抗战热潮,中国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神圣的抗战中去,世界上主张正义、爱好和平的人们也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有力的声援和支持。天主教、基督教作为当时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宗教力量,对中国的抗战持什么态度呢?笔者认为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应联系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来看待它们的政治行为,应把宗教上层的指导思想与广大信教人士的具体实际行动区分开来,把部分宗教败类的卖国行径与广大宗教人士的正义爱国行为区分开来。

一、天主教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天主教的信友人数,1900年是741592人,1932年达到2562742人^[1]。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来自世界各国,1929年达到2015人,1936年更达到2717人^[2]。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不定和当政者对帝国主义的逢迎、讨好,天主教乘中国混乱的机会大大扩张其在华的教会势力。天主教严格禁止教徒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传教士们总是喋喋不休地向教徒灌输逆来顺受思想:“要爱你们的邻舍”、“要爱你们的仇敌”、“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你们也要彼此相爱”等等,以腐蚀教徒反抗侵略的意志,养成甘于受剥削、受压制的奴隶性

格。对爱国的天主教徒,教会往往以不准享受宗教崇拜和死后下地狱相威胁,重者则处以开除教籍的惩罚,甚至收回土地以断其生路。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且遭到中国人民强烈抵抗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一致声讨时,世界天主教的最高统治者——梵蒂冈教宗庇护十一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34年初在国际上第一个宣布承认伪满洲国,从而自居于与中华民族相对立的立场上。梵蒂冈教廷还把东北从中国传教区划出去,成立东北传教区。1938年8月,教宗庇护十一还亲自接见伪满洲国的特使,以显示其亲日行为。1938年、1939年,教宗庇护十一、新继位的庇护十二分别致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与“满洲国”的“友好关系”。1939年3月14日,一度同情中国抗战的梵蒂冈驻华宗座代表蔡宁秉承教廷旨意,向中国天主教会发出“中立”的指令,要中国教会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抱“不偏左,不偏右”的态度,禁止中国教徒的爱国抗日活动。很明显,梵蒂冈教廷以讨好日本帝国主义换取日本对其在日占区传教活动的支持。抗日战争期间,有很多德籍的传教士到华北地区传教。到抗战结束时,全国天主教徒增至310多万人,其中日占区占大多数。

“七七”事变后,日本天主教会派神父田口芳五郎到中国北方进行特务活动。田口到天津向天

收稿日期: 2008 - 04 - 19

作者简介: 韩荣钧(1968 -),男,山东枣庄人,滨州学院讲师,扬州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津教区兼正定教区主教法国人文贵宾推销他的侵略理论,还把文贵宾介绍给日本侵略军驻津军官。1937年12月25日,田口乘飞机返回北京,文贵宾让他带给东京总主教一封信,信上说:“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衷心感谢你派了田口芳五郎神父到中国北方来,使教会和军队便于发生关系。”以文贵宾为代表的在华传教士开始与日本侵略军狼狈为奸,与中国人民为敌。

抗战期间,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下,华北地区有些神父也走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的道路,有的主动协助青年教友参加抗日活动。为阻止教友参与抗日活动,文贵宾于1938年3月16日以正定教区主教的身份发出通知:“我知道在我省某些地区有神父参与军事活动,他们发动或帮助教友参军。这种活动固然出于善意,但是很不明智,对我们的教会有很大的伤害。据我了解,正定教区的神父目前尚未参与这极不明智及被教会禁止的活动。由于事关中国教会的存亡和发展,为了避免这种不幸,我不能不禁止我们的全体司铎参与军事活动。”在这封公函里,文贵宾以“事关中国教会之存亡和发展”为借口来阻挡爱国神甫们的抗日活动,并把这种活动说成是“教会禁止的活动”,正说明文贵宾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

文贵宾还利用帝国主义传教士建立的情报网络为日军提供情报。在天津教区所辖各城镇,都有帝国主义传教士建立的情报站。国际特务司义芳在天津专门从事间谍活动,静海县的荷兰帝国主义分子杨仁址、沧县的意大利传教士贾国安、盐山县的南斯拉夫传教士叶利普等,都是天主教内比较老练的国际间谍。他们借“传教”的名义,收集八路军在农村抗日活动的情报。身为天主教区主教的文贵宾也经常向从外地来天津的神父打听八路军的活动情况,甚至还以“视察教务”为名,亲自到农村搜集情报。

他们还在教徒中散发来自日本天主教会的美化侵略的反动宣传材料,如下面所引:“对目前的中日战争,一方说是合法的自卫,另一方却坚决否认,若双方单纯看问题,无疑地一方是错误的。为了改变这种痛心的形势,我们想提醒两国教会的仆人和终生献身于天主的人经常诵读这句话:你为爱天主爱你的近邻吧!”下面的话反动政治意图

更加露骨:“我们主张当前的讨伐是符合正义的,其理由蕴藏着在中国中央政府允许由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而发生的事实里……在中日之间挑起战争,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散布灾祸,使我们两国沦于灭亡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者图谋的目的,这种灾祸是国家政治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相反,日本所追求的是避免这种灾祸,并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真实的持久的和平。”教会的上述所作所为完全显露了其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反动立场。

宗教是无国界的,但宗教徒是有祖国的。面对日寇的侵略行径,爱国的教徒们开始行动起来,以自己的言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爱国老人”之誉的天主教徒马相伯于1931年10月23日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对内绝对不许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31]。马相伯还先后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成会”、“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等爱国救亡组织,参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文化界人士1935年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及其他通电、文件,均由马相伯领衔发出。他还积极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马相伯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被梵蒂冈教宗任命为南京教区主教的于斌也积极参加抗战宣传活动,他先后八次前往欧美各国,争取西方各国对我国抗战之同情与援助。当时《大公报》载文说:“于主教到大学演讲,到无线电广播,在报纸上发表谈话,果敢地抨击强权……坚决地反对日本的横蛮。”^[31]于斌还组织中国天主教医药服务队从事战地救护和难民救助。天主教徒、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于北平沦陷后在校内组织“炎社”,取顾炎武不与异族合作之意,向师生宣传抗日救国。1942年底和1944年2月,他两次被日军逮捕,在酷刑下坚贞不屈,被判刑15年。

一些有正义感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抗战也给予了同情与支持。比利时传教士、《益世报》创办人雷鸣远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益世报》自创办以来,一直支持进步言论,成为民国四大报纸之一。东北沦陷后,该报特派员还深入沦陷区进行秘密采访,发表了《盗治下的沈阳》、《铁蹄下的长春》等,以第一手资料揭露和控诉了日寇在东北

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同

的暴行。对1931年日本特务挟持溥仪从天津赴长春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该报曾作详细报道。1946年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该报所刊文字曾被引为庭审佐证。1934年,雷鸣远任命该报总编辑刘豁轩兼总经理。当时罗隆基因“九·一八”事变发表《沈阳事件》一文批评不抵抗政策触怒当局,丢了教授一职。刘豁轩大胆聘请罗隆基为社论主撰。罗到任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就是《一国三公僵政局》,直斥当时政坛的混乱局面。罗隆基又接连在该报发表《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等抗战文章,《益世报》一时成为发布抗战言论的喉舌。雷鸣远对于这些反日言论,不但未加以阻止,而且还大加鼓励,因为他觉得自己已是一个中国人。长城抗战之时,年逾六十的雷鸣远亲自组织救护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参加救护工作。救护队行至河北遵化,当有人请雷鸣远讲话时,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要抗战到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天津《益世报》不用日本同盟通讯社的稿件,坚持刊发爱国言论,在英、法租界秘密销售。日本人对该报必欲除之而后快,总经理生保堂被日伪特务绑架杀害,《益世报》被迫停刊,雷鸣远也不得不撤到大后方。经过努力,1938年《益世报》终于在云南昆明复刊,雷鸣远亲自前往报馆祝贺,并鼓励同仁抗战到底。

战后国民政府唯一承认的沦陷区内大学——辅仁大学的生存也与天主教人士的苦心支撑有关。辅仁大学1933年后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办,1936年后,辅仁校务长是德国人雷冕神父。后来德、意、日成为轴心国,辅仁大学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得以继续在北平开办,而且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等条件。辅仁校长陈垣身陷北平,原有南下大后方的考虑,但几千师生的期望使他实在下不得狠心。1943年底,他的学生柴德赓有扶师南行的密谋。陈垣也同意南下,但被校务长雷冕神父察觉。雷冕与陈校长长谈数晚,晓以利害,认为陈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辅仁,有利于师生。如校长一走,辅仁难以为继,将很快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几千师生顿失依靠,将难以就职和求学。最后雷冕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陈垣终未成行。辅仁大学似沦陷区北平的“孤岛”,成为不肯就职于伪大学(日伪利用原址继续开办的大学,被称伪大学,如“伪北大”等)学人

的净土,一些抗日志士也以辅仁大学为基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

总之,尽管天主教上层确立了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的指导思想,也有不少宗教分子走向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道路,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许多天主教教士和信徒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正因为外国传教士在抗战中的积极表现,1939年12月21日《大公报》发表《敬谢全世界同情中国的宗教家》的社评,对外国教士给予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深刻的谢意。

二、基督教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都是一贯抱反对态度的。在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压迫的新时期,他们还炮制了一个“基督教爱国主义”的新口号,即所谓基督教徒不仅要寻求本国的利益,还要寻求别国的利益;基督徒应先是教徒而后才是各自国家的公民。该信条反映了基督教会意欲迷惑基督教徒脱离反帝爱国运动轨道的企图。“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青年会美国干事尚爱物认为,在这“混乱与不安”的时刻,许多青年“被迫倾向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因此他发起“青年与宗教运动”,以之与共产主义争夺青年^[4]。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紧之时,基督教在华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却大量出版带有迎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观点的读物。如在1933年出版的高级《农民宗教课本》第6册第27课讲到“爱国观点”时写道:“武力抵抗敌国……经济绝交……都是不妥当的、不彻底的。”这分明与当时的汉奸言论如出一辙。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广学会还出版了日本基督徒贺川丰彦所著的《爱的科学》一书,并且还邀请贺川到中国演讲,鼓吹“中日提携”,要求中国人民要象“爱主内兄弟”那样对待日本侵略者。

在全国抗战氛围高涨之时,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组织“基督教公民委员会”却在极力宣扬“非暴力主义”,并提出“非战方案”等。1937年5月,基督教协进会召开第十一届年会,再次强调“不使用武力而解决变乱”。世界基督教(新)学生同盟也大力提倡中日和解,指派中国青年会干事前往日本访问,“握手言欢”。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些基督教上层人士还认为,“为复仇而战是不对

的”、“为保卫祖国而战”也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的立场”。他们主张“开展一个全国性的与入侵者不合作的运动”,或者“制定一个可以排除两国分歧的方案”等。世界基督教(新)学生同盟还特地派美国人杜克担任远东区总干事,提倡举办“中日学生公祷日”,以“摒除仇恨的心理”。这些模糊政治视线的做法,无疑起到了在民族存亡关头麻痹中国人民抗敌斗志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便利侵略、巩固殖民统治,也想利用和控制基督教来为自己的侵略政策服务,但很难打入属于英美基督教会系统和所谓“自立”的中国教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其占领区封锁了所有英、美系统的教会、医院、学校和企业、机构等,并把英、美侨民及传教士关入集中营。日本以支持“中华教会自立”为名,成立“华北基督教团”,并把教会房产交给中国牧师,以收买具有传教士身份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日本利用基督教团向信徒宣传“大东亚圣战”、“日华亲善”思想,并用“祈祷和平”、“感恩礼拜”等宗教活动麻痹信徒的反抗意志。中华基督教团成了日本侵华的得力工具,许多基督教徒和外籍传教士成了日寇侵华的忠实帮凶。

但是真正具有爱国心的基督教徒绝不会置祖国的危亡于不顾,广大爱国基督教徒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刘湛恩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刘湛恩1923年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部总干事,1927年任沪江大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八·一三”事变中,他主持由沪江、东吴、圣约翰等大学组成的教会联合大学校政,并被推举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上海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他在租界继续坚持抗日活动。1938年初,梁鸿志派温宗尧拉他出任伪教育部长,被其严辞拒绝。4月7日,他被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身亡。

东北基督教人士阎宝航长期担任奉天青年会总干事。1929年秋,他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上,披露了显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田中奏折”,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九·一八”后,他联名其他东北人士上书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坚决抗日。他还在北平与高崇民、杜重远等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复东会”、

“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等爱国组织。1937年9月,阎宝航由博古、刘澜波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自觉地投身抗日救亡事业^[5]。

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赵紫宸于1931年10月1日在其主编的《真理与生命》院刊上发表《基督教徒对于日本侵占中国国土当持什么态度》一文,呼吁“将此次事实之真相,宣告于世界信众,并联合世界信众,特别是日本的信众,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扰乱世界的罪恶”^[6]。此后,该刊经常登载宣传抗日爱国的文章。1941年12月8日,日军包围燕京大学,制造了著名的“燕大教授被捕事件”。赵紫宸先生在这次事件中被关押时间最长,共193天。在凶恶的日寇面前,赵紫宸先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下面的这一首赵紫宸先生在狱中作的诗篇,充分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

万万貔貅不是兵,长绳坚拷缚书生。

空鹰未识巢心地,海鳄安能入管城。

亮节惊人完赵璧,淫威无计复秦坑。

虜庭会审真堪笑,报国居然在息争。

监狱中环境恶劣,当时50多岁的赵先生时时面对饥饿、寒冷、疾病乃至死亡的威胁,仍然关怀同事,想念亲人,忧虑祖国,并作诗抒怀,铭记于心。出狱后,在一天半时间内凭记忆写出狱中所作诗170多首,命名为《南冠集》,后来又写了《系狱记》一书,记载他和其他同事在狱中的情况。

更多的基督教徒则在政治、军事、外交、文教、医护等领域努力为国效力。“九·一八”后,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积极支持学生救亡,亲自组织全校师生星期日到各街头商店盘查日货。1938年,吴被聘为参政员。1943年,吴贻芳还远赴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战。著名外科专家,基督教徒沈克非出任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并随中国远征军入缅、印作战。

许多有正义感的外籍传教士目睹日军的暴行,也开始同情并支持中国的抗战。“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并亲自带领学生上街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他还指责英、美等国对日侵华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就象“瘴气”,“给人们带来了灾难”^[7]。抗战爆发后,他尽可能掩护抗日分子免遭日军抓捕,积极支持爱国学生奔赴大后方甚至解放区。司徒雷登明确指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如果有

学生要求学校帮助其离开沦陷区,只要不是单纯转学而是为了抗日,都要给以支持。司徒雷登还积极支持埃德加·斯诺采访陕甘宁根据地,燕京大学的校刊《燕京周刊》首次连续登载斯诺写的《毛泽东访问记》等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10月在美国出版,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总之,尽管天主教、基督教上层标榜宗教的超国家、超民族的性质,在中国面临危亡的时刻还在鼓吹“非暴力主义”,宣扬中日和解,但许多拥有爱国心或正义感的教徒和传教士还是摆脱了宗教的羁绊,为中国神圣的抗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的甚至为之献出了生命。在祖国和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芬芳的华章。

参考文献:

- [1] 德礼贤.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14部分)[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94.
- [2] 晏可佳. 中国天主教简史[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237.
- [3] 佚名. 于斌主教在欧美工作成绩[N]. 大公报, 1938 - 05 - 12.
- [4] 江文汉.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M]. 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15.
- [5] 朱信泉, 严如平. 民国人物传(第四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41.
- [6] 寿祝衡, 赵紫宸.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二十一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45.
- [7] [美]司徒雷登. 在华五十年[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2: 106 - 107.

On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ty During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AN Rongju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 formed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during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The influential upper stratum of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ty took a neutral supporting attitude towards the War. But the patriotic followers went to the War with the spirit of sacrifice.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 patriotic activities of the religious followers and the reactionary thought of the upper stratum.

Key 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atholicism; Christianity

(责任编辑: 喻世华)